

崔向东 / 主编

历史与社会论丛

 吉林大学出版社

(第二辑)



本书获得辽宁省重点学科资金资助

主 编 崔向东

副主编 刘宝军 庞宝庆

历史与社会论丛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历史与社会论丛 / 崔向东主编. —长春 :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5601-5638-5

I. ①历… II. ①崔…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0050 号

书名: 历史与社会论丛
作者: 崔向东 主编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 丛立新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7.25 字数: 336 千字
ISBN 978-7-5601-5638-5

封面设计: 刘 瑜
吉林省吉财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8499826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目 录

中国古代史研究

说汉代官吏“粪土臣”自称·····	王子今(3)
中国古代北方草原畜牧业的发展与传承·····	何天明(12)
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传记史学观念的异同·····	王成军(25)
崔寔著述的辑录与流传·····	秦进才(32)
汉代民间秩序的形成·····	稻叶一郎撰 崔向东译(46)
辽朝兴中府的设置及其意义·····	任仲书(64)
辽金时期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发展·····	张志勇(71)
简评金大定年间汉人宰相石琚·····	吴凤霞(78)
金代辽宁地区的行政建置述论·····	肖忠纯(84)
说汉代官吏“粪土臣”自称高丽忠烈王如元考·····	孙红梅(89)
试论明清鼎革期辽南的历史地位·····	高志超(93)
清代热河蒙地开发政策述论·····	穆釜臣(100)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清末民初奉天省农业试验场发展述论·····	王凤杰(109)
清末宪政思潮中的议院方案探析·····	王兆刚(114)
从《大同书》看康有为的女权思想·····	李 皓(120)
中国近代海军的概况及产生原因·····	李洪英(127)
从《盛京时报》看民国初年东北地方政府的禁毒斗争·····	王 香(133)

辽西地区抗日义勇军的建立及斗争·····	问 昕(138)
中国当代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	刘宝军(144)

世界史研究

论日本天皇制的理论特征·····	解晓东(153)
侵华日军“古贺联队”的覆灭·····	潘德昌 高远(158)
日本金融界与中日甲午战争·····	庞宝庆(162)
传统美国外交史学中的文化·····	曲 升(168)
美国《1969年出口管理法》探析·····	温容刚(174)
非洲对美国建立非洲司令部的反应·····	曹升生(184)
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探析·····	巩村磊(191)

文化遗产研究

民族植物学视域下的上甲彩棉·····	王柏中(199)
论辽宁沿海经济带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于富业(206)
沈阳铁西区工业遗产发展路径探析·····	杜雨山 杨志强 刘静涛 郭建辰(213)

学术资讯与综述

三十年来我国史学理论研究述论·····	郭恪谨(221)
“文化大革命”史研究论著索引·····	高 旭(233)



中国古代史研究

说汉代官吏“粪土臣”自称^①

王子今

【摘要】汉代官吏习用“粪土臣”自称。传世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献资料都可以提供共同的信息。在传统农耕生活中，久有“粪土”“极贱”的常识。司马迁《报任安书》所谓“函粪土之中”，则是指最屈辱、最痛楚、最愁苦的境况。面对主上称“粪土臣”，体现极端自卑、自贱的态度。汉代政治生活中，可以与“粪土臣”自称联系起来分析的，还有“草莽臣”和“牛马走”自称。这一情形出现于汉代，是和皇帝威权至上地位的形成，和专制制度确定和巩固的历史过程相一致的。而中国传统社会意识中奴性心理生成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条件，也可以通过相关分析进行探索。

【关键词】汉代 粪土臣 官吏 称谓

汉代文献遗存和出土资料均可见官吏自称“粪土臣”情形。通过“粪土臣”这种特殊的社会称谓形式，可以瞭解帝制奠基时代政治生活等级规范形成并初步确定的情景，认识奴性心理生成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条件。

一、汉代政治史文献中的“粪土臣”

汉武帝即位初，好微行驰猎，“上以为道远劳苦，又为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寿王与待诏能用算者二人，举籍阿城以南，盩屋以东，宜春以西，提封顷亩，及其贾直，欲除以为上林苑，属之南山。又诏中尉、左右内史表属县草田，欲以偿鄠杜之民。吾丘寿王奏事，上大说称善。”这一计划对于当地民生显然有所损害。据《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时朔在傍，进谏曰：‘臣闻谦逊静恹，天表之应，应之以福；骄溢靡丽，天表之应，应之以异。今陛下累郎台，恐其不高也；弋猎之处，恐其不广也。如天不为变，则三辅之地尽可以为苑，何必盩屋、鄠、杜乎！奢侈越制，天为之变，上林虽小，臣尚以为大也。’”东方朔提出三条反对的理由：“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弃成功，就败事，损耗五谷，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长养麋鹿，广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虚，又坏人冢墓，发人室庐，令幼弱怀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营之，垣而囿之，骑驰东西，车骛南北，又有深沟大渠，夫一日之乐不足以危无堤之

^① 基金项目：本文为200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秦汉社会称谓研究”（项目批准号：07BZS007）成果。

與，是其不可三也。”以为“务苑囿之大，不恤农时，非所以强国富人也”。其中有与历史上昏庸暴虐之君对照，所谓“夫殷作九市之宫而诸侯畔，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民散，秦兴阿房之殿而天下乱”的激切言辞。东方朔最后说道：“粪土愚臣，忘生触死，逆盛意，犯隆指，罪当万死，不胜大愿，愿陈泰阶六符，以观天变，不可不省。”^[1]

《汉书》记载东方朔谏言所见“粪土愚臣”，是较早使用“粪土臣”这种自称的一则实例。东汉名臣蔡邕曾经入狱治罪，《后汉书》卷六〇下《蔡邕列传》记述：蔡邕得罪与专权宦官集团关系密切的政治势力，“于是诏下尚书，召邕诘状。”蔡邕上书自陈，未能得到宽宥，“于是下邕、质于洛阳狱，劾以仇怨奉公，议害大臣，大不敬，弃市。事奏，中常侍吕强愍邕无罪，请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诏减死一等，与家属髡钳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即使如此，政敌依然“使客追路刺邕”。蔡邕面对人生悲剧时的上书，有这样的内容：“邕上书自陈曰：‘……今年七月，召诣金商门，问以灾异，赉诏申旨，诱臣使言。臣实愚贱，唯识忠尽，出命忘躯，不顾后害，遂讥刺公卿，内及宠臣。实欲以上对圣问，救消灾异，规为陛下建康宁之计。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诽谤卒至，便用疑怪。尽心之吏，岂得容哉？诏书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政思过，除凶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纳之福，旋被陷破之祸。今皆杜口结舌，以臣为戒，谁敢为陛下尽忠孝乎？’”蔡邕在请罪的同时仍然坚持“忠臣直言”的正义性，又表示愿自当“咎患”，而保全蔡质：“臣季父质，连见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数见访逮。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门户，非复发纠奸伏，补益国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托名忠臣，死有余荣，恐陛下于此不复闻至言矣。臣之愚冗，职当咎患，但前者所对，质不及闻，而衰老白首，横见引逮，随臣摧没，并入坑塹，诚冤诚痛。臣一人牢狱，当为楚毒所迫，趣以饮章，辞情何缘复闻？死期垂至，冒昧自陈。愿身当辜戮，勾质不并坐，则身死之日，更生之年也。””这篇文字收入《蔡邕集》，题《被收时表》^[2]，开篇写道：“议郎粪土臣邕顿首再拜上书皇帝陛下”，篇末则以“臣邕死罪”结束。^[3]篇题亦有作《尚书诘状自陈表》者。^[4]

《三国志》卷一《魏书·文帝纪》记载汉帝禅位于魏，裴松之注引《献帝传》记述汉魏禅代事，曹丕有假意辞让的虚伪表演，上书中也可见“粪土臣”称谓：“庚申，魏王上书曰：‘皇帝陛下：奉被今月乙卯玺书，伏听册命，五内惊震，精爽散越，不知所处。臣前上还相位，退守藩国，圣恩听许。臣虽无古人量德度身自定之志，保己存性，实其私愿。不寤陛下猥损过谬之命，发不世之诏，以加无德之臣。且闻尧禅重华，举其克谐之德，舜授文命，采其齐圣之美，犹下咨四岳，上观璇玑。今臣德非虞、夏，行非二君，而承历数之谪，应选授之命，内自揆抚，无德以称。……臣虽鄙蔽，敢忘守节以当大命，不胜至愿。谨拜章陈情，使行相国永寿少府粪土臣毛宗奏，并上玺绶。’”^[5]曹丕上书所谓“使行相国永寿少府粪土臣毛宗奏”，“粪土臣”虽然不是直接的自称，却是指身边近臣，一如上文所谓“鄙蔽”“无德之臣”，也明显有标榜自谦的涵义。

在另一篇存有疑点的文献《汉杂事秘辛》中，也可以看到“大将军参录尚书事乘氏粪土臣冀顿首再拜承制”的词语。^[6]这一资料，或许也可以看作能够为汉代通行“粪土臣”自称提供助证的有一定参考意义的信息。

二、汉简所见“粪土臣”自称

出土汉简数据亦可见“粪土臣”称谓。

例如居延汉简：

肩水候官令史饒得敬老里公乘粪土臣意味死再拜上言

□变事书□ (387. 12, 562. 17)^[7]

粪土臣德昧死再拜上言变事书印曰臣德其丁丑合蒲莛□ (E. P. T52: 46A)

□粪土臣既往□ (E. P. T65: 541)^[8]

又敦煌汉简：

使西域大使五威左率都尉粪土臣△稽首再拜上书 (117)

使西域大使五威左率都尉粪土臣△稽首再拜上书 (118)

使西域大使五威左率都尉粪土臣△稽首再拜上书 (146)^[9]又如居延汉简如下文字：

□粪土□ (E. P. T53: 273)^[10]很可能也与出现“粪土臣”字样简例的文式相同。

河西地方出土汉代简牍所见“粪土臣”，反映自称“粪土臣”已经成为社会语言习惯，成为僻远地方亦认真遵行的文书定式。

三、“粪土”“极贱”

《论语·公冶长》记载了教育家孔子的著名言论：“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圻也。’”孔子以“粪土之墙”比喻宰予“志气昏惰，教无所施”。^[11]后来董仲舒又曾经以“粪土之墙”比喻社会问题的严重：“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圻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12]

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可见“粪土”字样：

子鼠毆以亡盜者中人取之臧穴中粪土中为人靺面小目=囧=广颊矐目盜也所入矣不得 (30)

己鸡毆以亡盜者中人毆臧困屋屈粪土中塞木下其为人小面长赤目贱人毆得 (35)^[13]
《急就篇》卷三：“屏厕清溷粪土壤。”颜师古注：“屏，僻宴之名也。厕之言侧也，亦谓僻侧也。清，言其处特异余所常当加洁清也。溷者，目其秽浊也。屏厕清溷，其实一耳。柔土曰壤。言屏厕之地，以粪秽则其土为壤也。”^[14]也体现“粪土”在社会日常生活中通常的语义。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说，“昔者越王句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建议经营之道，涉及“贵”与“贱”的辩证关系。司马迁写道：“计然曰：‘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粢，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粢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

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据说勾践采用了计然的策略，“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司马贞《索隐》：“夫物极贵必贱，极贱必贵。贵出如粪土者，既极贵后，恐其必贱，故乘时出之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者，既极贱后，恐其必贵，故乘时取之如珠玉。此所以为货殖也。”^[15]计然所谓“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所谓“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体现“粪土”“极贱”的常识。

司马迁《报任安书》自陈心志，也曾经说：“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继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16]司马迁所说“函粪土之中”，是指最屈辱、最痛楚、最愁苦的境况。其具体情形，用司马迁自己的话来形容，即“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捶，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17]，视徒隶则心惕息”。

也有以“粪土”指代一般意义上的黄土、地土、土壤的情形。《后汉书》卷三九《赵咨传》说赵咨“在官清简，计日受奉，豪党畏其俭节”，临终期望“薄敛素棺，籍以黄壤，欲令速朽，早归后土”。他说，“夫亡者，元气去体，贞魂游散，反素复始，归于无端。既已消仆，还合粪土。”又批判“暴秦”厚葬的罪恶：“违道废德，灭三代之制，兴淫邪之法，国货糜于三泉，人力单于郾墓，玩好穷于粪土，伎巧费于窀穸。自生民以来，厚终之敝，未有若此者。”^[18]“粪土”就是普通的“黄壤”，这是以基本农耕知识为出发点而形成的观念。

《续汉书·百官志五》刘昭注补引应劭《汉官》：“张角怀挟妖伪，遐迹摇荡，八州并发，烟炎烽火，牧守鼎裂，流血成川。尔乃远征三边殊俗之兵，非我族类，忿鸷纵横，多僵良善，以为己功，财货粪土。”^[19]东汉末年的军阀战争中，审配献书袁谭，说道：“伏惟将军至孝蒸蒸，发于岐嶷，友于之性，生于自然，章之以聪明，行之以敏达，览古今之举措，睹兴败之征符，轻荣财于粪土，贵名位于丘岳。何意奄然迷沈，堕贤哲之操，积怨肆忿，取破家之祸！翹企延颈，待望讎敌，委慈亲于虎狼之牙，以逞一朝之志，岂不痛哉！”^[20]所谓“财货粪土”，所谓“轻荣财于粪土”，也都取用“粪土”“极贱”之义。

《后汉书》卷六三《李杜列传》最后有对于李固、杜乔的赞扬：“论曰：夫称仁人者，其道弘矣！立言践行，岂徒徇名安己而已哉，将以定去就之概，正天下之风，使生以理全，死与义合也。夫专为义则伤生，专为生则害义，专为物则害智，专为己则损仁。若义重于生，舍生可也；生重于义，全生可也。上以残暗失君道，下以笃固尽臣节。臣节尽而死之，则为杀身以成仁，去之不为求生以害仁也。顺、桓之间，国统三绝，太后称制，贼臣虎视。李固据位持重，以争大义，确乎而不可夺。岂不知守节之触祸，耻夫覆折之伤任也。观其发正辞，及所遗梁冀书，虽机失谋乖，犹恋恋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顾视胡广、赵戒，犹粪土也。”^[21]以高洁和卑污比照，所谓“其顾视胡广、赵戒，犹粪土也”，已经明确以“粪土”形容朝臣。“胡广、赵戒”之流，当然是史官意识中的“粪土臣”了。这些“粪土臣”与“生以理全，死与义合”之“称仁人者”，形成了言行品格的鲜明的对立。

四、粪土臣·草莽臣·牛马走

汉代政治生活中，可以与“粪土臣”自称联系起来分析的，还有“草莽臣”和“牛马走”自称。

《前汉纪》卷二二《孝元皇帝纪》记载，永光元年“冬十有二月，丞相于定国赐安车驷马，免。子永嗣位，至御史大夫，尚馆陶公主施。……周堪复为光禄勋。与张猛皆给事中，见亲任，而石显等数赞毁之。刘向以草莽臣上书曰：‘臣闻舜命九官，济济相让，和之至也。众贤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故萧韶九成，凤皇来仪，击磬拊石，百兽率舞。及至周文，开基西郊，杂集众贤，莫不肃和，崇推让之风，以息忿争之讼。’”刘向回顾周代历史，指出文武周公时代，“朝臣和于内，万国欢于外。”“下至幽、厉之际，朝廷不和，转相非怨。”“当此之时，日月薄蚀而无光。”“天变见于上，地变动于下。”“自此之后，天下大乱”而“众灾并起”，周政“遂至陵迟，不能复兴”。刘向说，“由此观之，气和致祥，气乖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当今邪正杂糅，忠谗并进。章交公车，人满北军。朝臣乖忤，分曹为党。更相潜怨，不可称言。是以灾异并起，皆妖气之所致也。”“谗邪所以并进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贤人，行善政，而或谮之，则贤人退而善政消矣。怀多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持不断之意者，开群枉之门。谗邪进者贤人退，群枉盛者正士消。”“考祥应之福，省灾异之祸，以揆当时之变，仰鉴前古之事，宜放远佞人之党，广开众正之路，决断狐疑，分明去就，则百异消灭，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据《前汉纪》记录，“显等见其书而愈与许史比周而怨向。向等遂禁锢十余年。”^[22]刘向上书事，《汉书》卷三六《刘向传》只言“更生见堪、猛在位，几已得复进，惧其倾危，乃上封事谏曰”^[23]，没有反映“以草莽臣上书”情节。

许慎《说文解字》卷一五下《叙》写道：“召陵万岁里公乘艸莽臣冲稽首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臣伏见陛下以神明盛德，承遵圣业，上考度于天，下流化于民。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万国咸宁，神人以和。……’”“艸莽臣”“上书”也就是“草莽臣上书”。

《三国志》卷一一《魏书·管宁传》“宁称草莽臣上疏”^[24]，《三国志》卷六四《吴书·孙綝传》“休既即位，称草莽臣，诣阙上书”^[25]，也都是类似史例。^[26]

《后汉纪》卷二一《孝桓皇帝纪上卷》记载，汉桓帝永寿元年（155），“时梁氏威势倾天下，而上无继嗣，灾异数见。颍阴人刘陶上疏”，为受迫害的朱穆、李膺申诉：“故武丁得傅说，以消鼎雉之变；周宣用山甫，以济夷、厉之荒。窃见冀州刺史朱穆、乌桓校尉李膺，皆履正清修，贞介绝俗。穆前在冀州，弹纠豪杰，埽灭饕恶，肃清万里，不仁者远，虽山甫不畏强御，诚无以逾也。膺前后历职，正身率下。及掌戎马，镇抚北疆，神武扬于朔州，强胡慑于漠北。文既俎豆，武亦干戈，功遂身退，家无私积。斯则中兴之良佐，国家之柱臣也。宜还本朝，夹辅王室，不合久屈间曹，委于草莽。”“书奏，上善其言。”^[27]刘陶上疏所谓“委于草莽”，是指埋没民间。“草莽”的涵义，应是指社会底层。《后汉书》卷二二《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论曰：“降自秦、汉，世资战力，至于翼扶王运，皆武人屈起。亦有鬻屠狗轻猾之徒，或崇以连城之赏，或任以阿衡之地，故执疑则隙生，力侔则乱起。萧、樊且犹縲继，信、越终见菹戮，不其然乎！自兹以降，迄于孝武，宰辅

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缙绅道塞，贤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关之怨。其怀道无闻，委身草莽者，亦何可胜言。”^[28]此“委身草莽”与刘陶所谓“委于草莽”，“草莽”语义，并无二致。又《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孟尝》“桓帝时，尚书同郡杨乔上书荐尝曰”：“尝单身谢病，躬耕垄次，匿景藏采，不扬华藻。实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沈沦草莽，好爵莫及，廊庙之宝，弃于沟渠”^[29]之所谓“沈沦草莽”亦同。汉人关于“草莽”的说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草莽臣”的涵义。

《文选》卷四一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开篇称“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对于所谓“牛马走”，李善注：“‘走’，犹仆也。言己为太史公，掌‘牛马’之仆。自谦之辞也。”^[30]吕延济注：“‘走’，犹仆也。言己为太史公，‘牛马’之仆，盖自卑之辞。”^[31]这似乎是致“故人”书信中的“自谦之辞”、“自卑之辞”，^[32]与前说“粪土臣”、“草莽臣”属于面对帝王的特定辞义有所不同。然而同样反映着官场生活，所以也值得我们关注。有人说“牛马走”应即“先马走”。《淮南子·道应》说勾践为“先马走”，是“为吴兵先马走”。高诱注：“先马走，先马前而走也。”王念孙以为“为吴兵先马走”应为“为吴王先马”。刘文典写道，“据注云‘先马，（句。）走先马前’，则正文无走字明矣。为吴王先马，即上文所谓身为臣也。”又说“先、洗古字通”。^[33]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四“洗马”条也指出：“吴兵”，“当作‘吴王’”。^[34]这样说来，更多地重视这一称谓与“粪土臣”、“草莽臣”的共同点，也许是适宜的。

宋代学者吴仁杰指出，“牛马走”，其实是“先马走”之误：“本《传》载子长书自‘少卿足下’始。《文选》又冠以‘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凡十二字。仁杰曰：此犹刘向上书而《汉纪》言其自称‘草莽臣’盖得其本文如此。五臣注：‘走，犹仆也。言己为太史公，掌牛马之仆。’按‘牛’当作‘先’字之误也。《淮南书》曰：‘越王句践亲执戈，为吴王先马走。’《国语》亦云：‘句践亲为夫差前马。’《周官·太仆》：‘王出入则前驱。’注：‘如今导引也。’子长自谓‘先马走’者，言以史官中书令在导引之列耳。故又云‘幸得奏薄技出入周卫之中’。《百官表》有‘太子先马’，盖亦前驱之称。或作‘洗马’，循误至此。”^[35]这一见解，吴仁杰的同时代人似乎有所认同。^[36]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四“洗马”条则说，“‘洗马’者，马前引导之人也。”^[37]

五、“粪土臣”自称与帝制时代的政治生活规则

自称“粪土臣”的情形出现于汉代。这是和皇帝专制制度确定和巩固的历史过程相一致的。后来这一称谓长期使用，反映了帝制时代臣下自卑意识和奴化心理的恒定性。在有的历史时期，“粪土臣”自称甚至成为法定的文书书写程序，列入具有规范性意义的公文条令之中。如《宋书》卷一五《礼志二》：“辞关板文云：‘某官粪土臣某甲临官。稽首再拜辞。’制曰右除粪土臣及稽首云云。某官某甲再拜辞。以‘令曰’代‘制曰’。某官官臣者，称臣。”^[38]

刘泽华曾经论述王权政治体制下的“臣下的本体性卑贱”和“臣下的功能性卑贱”。^[39]有学者亦曾讨论中国古代“百官皆奴”的意识和“罪臣意识”。而这些意识在秦汉时期已经有显著的表现。^[40]通过有关“粪土臣”一类称谓的考察，可以增进对相关历史文

化现象的认识。鲁迅论读史，曾经指出由此可以“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41]，可以明白“被愚弄了的性灵”是怎样的“终于并不清醒过来”，可以明白“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42]。对于“粪土臣”自称这一历史现象的讨论，正有益于认识“奴性的由来”，以及千百年来文化“熏陶”的方式。或许理解一系列相关的历史文化现象，如王亚南所说，“才会明白”“我们中国人的气质”“为什么像是特别适宜于专制主义政治”。^[43]

古来其实也屡有“臣”在“君”权面前期求礼遇的告诉。《孟子·离娄下》：“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讎。’”^[44]《孟子》强调的，是“君”对于“臣”符合“礼”的有限的尊重。应当注意，这是在帝制形成之前的政治主张。所谓“君之视臣如土芥”，“土芥”，是低于“犬马”的，或解作“泥土草芥”。^[45]而《贞观政要》载魏征语引“土芥”正作“粪土”：“孟子曰：‘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讎。’虽臣之事君无二志，至于去就之节，当缘恩之厚薄。然则为人主者，安可以无礼于下哉？”^[46]所谓“君视臣如粪土”，自然和臣自视如“粪土”不同。这里魏征所表述的，是许多士人共同的期望，即所谓“君臣相遇”。^[47]不过，即使在最理想的境界，君臣依然是君臣。“君尊臣卑是传统思想文化的大框架。”^[48]臣子们“君视臣如手足”的幻想，最终只能是妄想。

【注释】

[1] 《汉书》，中华书局 1962 年 6 月版，第 2851 页。

[2] 〔明〕梅鼎祚编《东汉文纪》卷一九《蔡邕》亦题《被收时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 《蔡中郎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八《汉蔡邕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 《三国志》，中华书局 1959 年 12 月版，第 1 册第 70 页。

[6] 〔明〕梅鼎祚编：《东汉文纪》卷四《顺烈梁皇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照：《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 年 1 月版，下册第 548 页。

[8]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隧》，文物出版社，1990 年 7 月版，第 230 页、第 455 页。

[9] 吴初骧、李永良、马建华：《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 年 1 月版，第 11 页、第 13 页。

[10] 《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隧》，第 298 页。

[11] 〔元〕胡炳文：《论语通》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 2504 页。

[13]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放马滩秦简》，中华书局 2009 年 8 月版，第

84 页。

- [14] [汉] 史游撰、[唐] 颜师古注：《急就篇》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5] 《史记》，中华书局 1959 年 9 月版，第 3256~3257 页。
- [16] 《史记》，第 2732~2733 页。
- [17] 《六臣注文选》卷四一作“见狱吏则头抢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8] 《后汉书》，中华书局 1965 年 5 月版，第 1314~1315 页。
- [19] 《后汉书》，第 3621 页。
- [20] 《后汉书》卷七四下《袁谭传》，第 2415 页。
- [21] 《后汉书》，第 2094~2095 页。
- [22] 《前汉纪》卷二二《孝元皇帝纪中卷》，张烈点校：《两汉纪》，中华书局 2002 年 6 月版，第 383~385 页。
- [23] 《汉书》，第 1932 页。
- [24] 《三国志》，第 356 页。
- [25] 《三国志》，第 1449 页。
- [26] 稍晚又有《晋书》卷五一《皇甫谧传》：“武帝频下诏敦逼不已，谧上疏自称草莽臣曰：‘…….’”中华书局 1974 年 11 月版，第 1415 页。
- [27] 《后汉纪》卷二一《孝桓皇帝纪上卷》，《两汉纪》，第 403~404 页。周天游校注《后汉纪校注》：“范书作‘书奏不省’。按永寿二年，拜膺为度辽将军，穆为尚书，则袁纪是。”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年 12 月版，第 580 页。
- [28] 《后汉书》，第 787 页。
- [29] 《后汉书》，第 2474 页。
- [30] 《文选》，中华书局 1977 年 11 月版，第 576 页。
- [31] 《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 1987 年 8 月版，第 764 页。
- [32] 《淮南子·道应》说勾践为“先马走”，是“为吴兵先马走”。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四“洗马”条说：“当作‘吴王’。”
- [33] 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 1989 年 5 月版，第 393~394 页。
- [34]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 1994 年 5 月版，第 856 页。
- [35] [宋] 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卷七“太史公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36] 如南宋冯时行《和张仲山寄酒》写道：“余波借与草木春，况是江头钓鱼叟。更烦遣骑日联翩，暖热缙云先马走。”《缙云文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37]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四“洗马”条：“《越语》：句践身亲为夫差前马。《韩非子》云为吴王洗马。洗音铤。《淮南子》云‘为吴兵先马走’。（当作‘吴王’）《荀子》：天子出门诸侯持轮挟舆先马。贾谊《新书》：楚怀王无道，而欲有霸王之号。铸金以象诸侯人君，令大国之王编而先马。梁王御宋王骖乘，滕薛卫中山之君随而趋然。则‘洗马’者，马前引导之人也。亦有称‘马洗’

者。《六韬》：赏及牛豕马洗廐养之徒。《汉书·百官表》：太子太傅少傅属官有先马。张晏曰：先马，员十六人，秩比谒者。‘先’或作‘洗’。又考《周礼》齐右职云：凡有牲事则前马。注：王见牲则拱而式居马前郤。”《日知录集释》，第856页。

[38] 《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版，第383页。

[39] 刘泽华：《王权思想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版，第131~133页。

[40] 雷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4月版，第194页。

[41] 鲁迅：《准风月谈·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卷第255页。

[42] 鲁迅：《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卷第57~58页。

[43]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6月版，第45页。

[44] 杨伯峻编著：《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1月版，第186页。

[45] 《孟子译注》，第186页。

[46] 〔唐〕吴兢：《贞观政要》卷三《君臣鉴戒》。《贞观政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9月版，第82页。

[47] 《贞观政要》卷三《君臣鉴戒》：“夫君臣相遇，自古为难。以石投水，千载一合。以水投石，无时不有。其能开至公之道，申天下之用，内尽心膂，外竭股肱，和若盐梅，固同金石者，非惟高位厚秩，在于礼之而已。”《贞观政要》，第81页。

[48] 《王权思想论》，第129页。

【作者简介】王子今（1950—），河北武安人，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校外专职研究人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古代北方草原

畜牧业的发展与传承

何天明

【摘要】在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文化区中，畜牧业自古以来基本呈现出比例不断加重、规模不断扩大、影响日益深远、各族互有传承的历史态势。朱开沟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代，游牧业逐步上升到突出地位。匈奴政权时期，游牧业快速具备了规模性。此后，直到蒙古族统治北方草原，游牧业没有出现大的曲折。历史发展证明，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文化是以畜牧业为突出特征的复合文化。

【关键词】北方草原 畜牧业 复合文化

在人类创造的文化中，畜牧文化是一种主要类型。近年来，学界对北方草原文化的研究有所推进，但对于中国古代北方草原畜牧业文化的研究，大多还是从游牧经济以及与此相应的风俗习惯方面深入。纵观中国古代北方草原畜牧业的发展，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梳理和研讨。其中，从北方草原畜牧业起源与发展的全过程去研究各族之间的交流与传承，就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一般来讲，畜牧业生产是以饲养数量较多的牲畜和家禽类动物为主要目的。因各个地区自然环境和气候不同，其经营形式又主要有流动性与非流动性畜牧。流动的为游牧，多发生在平均海拔较高、区域广阔、存在比较固定的沙地、气候呈干旱或半干旱型、年降水量较少、寒冷期较长并经常出现大风雪、夏季较炎热且又时间较短的地区。中国古代北方草原的自然环境基本属于这种类型。尽管北方草原不同地区进入从事狩猎业和畜牧业的时间因自然环境的差别有所先后，但随着北方草原历史的发展，游牧畜牧业则逐步成为古代北方草原地区具有突出特色的生产和生活形态。所以，在研究中国古代北方草原畜牧业的发展与传承时，首先遇到的就是农业与畜牧业分工的问题。

中国古代北方草原地区农业与畜牧业的大分工发生在远古时代，导致分工的基本因素与世界许多地区远古时期的历史有一定的类似性。恩格斯曾经以亚洲为例对人类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做了比较详尽的论述，他认为，这次分工的原因是“游牧部落生产的生活资料，不仅比其余的野蛮人多，而且也不相同。同其余的野蛮人比较，他们不仅有数量多得多的牛乳、乳制品和肉类，而且有兽皮、绵羊毛、山羊毛和随着原料增多而日益增加的纺织物。这就第一次使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1]这段论述是恩格斯把握第一次大分工的一个关键点，其中，畜牧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充足和剩余产品的出现，是分工的物质基础